

“双重忠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与以色列政府的交涉及其影响(1948—1950)

王 健 吕 游

摘要:对犹太人“双重忠诚”的指责从公元一世纪开始随着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而广泛传播,近代以来则成为反犹主义的典型词汇。随着1948年以色列建国,作为非锡安主义犹太人代表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与以色列政府,对以“双重忠诚”问题为核心的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关系定位的交涉持续不断,一直到1950年双方领导人会谈并发表“交换意见”公开声明后才告一段落。然而“双重忠诚”背后的身份认同危机并未真正解决,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和以色列政府就“双重忠诚”问题达成的妥协对双方内外关系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美国犹太人;双重忠诚;以色列;反犹主义;锡安主义

“双重忠诚”(Dual loyalty/allegiance)一词在政治学中的含义是同时忠诚于两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它们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并有可能发生利益冲突。而一旦该词与犹太人联系到一起就成为了典型的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词汇。欧洲种族主义与排外监测中心^①于2005年发布的《反犹主义定义》,^②明确将指责犹太人双重忠诚作为反犹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此后,欧洲议会反犹主义工作组、美国国务院、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等机构先后采纳了这一定义。这一定义也颇具争议,被认为限制了对以色列的批评,“尤其将对以色列的批评与反犹主义联系起来,集中表现在将反犹主义与对以色列政府的批评混为一谈,被认为阻碍了为巴勒斯坦人争取权利”。^③

历史上对犹太人双重忠诚的指责由来已久。据美国犹太裔民权活动家列尼·扎金(Leonard P. Zakim)的研究,“双重忠诚”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古罗马帝国时期。^④流散犹太人在居住国一方面面临以“双重忠诚”为代表的反犹主义压力,另一方面也担心由于异族通婚而被所在国家主体民族同化。美国著名犹太史专家雅各·瑞德·马库斯(Jacob Rader Marcus)在其专著《美国犹太人,1585—1990年:一部历史》中曾指出,“双重忠诚的问题很早就出现了。……某人既忠于犹太国家又忠于自身享有公民权的国度,这个假设的问题要上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犹太人的解放引发了争论:‘将一切给予作为人[个体]的犹太人;对作为一个民

作者简介:王健,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邮编200020);吕游,上海大学历史系(邮编200444)。

①2007年,根据欧盟理事会No 168/2007号决议,该机构(European Monitoring Centre on Racism and Xenophobia)改组为欧盟基本权益组织(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②“Working Definition of Antisemitism”(PDF),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304162430/http://www.fra.europa.eu/fraWebsite/material/pub/AS/AS-WorkingDefinition-draft.pdf>, 2022年6月7日。

③李大伟:《反犹主义概念的起源与流变》,《世界历史》2021年第5期,第125页。

④Leonard P. Zakim, Janice Ditchek, *Confronting Anti-Semitism: a Practical Guide*, New York: KTAV Publishing House, Inc., 2000, p.26.

族的犹太人则什么都不给。’”^①近代以来,针对犹太人最典型的“双重忠诚”事件是1894年在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②受此影响于1896年出版了《犹太国》一书,认为欧洲的“犹太人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或宗教问题,而是民族问题,其解决方法是建立犹太人的自治国家。他指出,“我们真诚地在各地尽力融入我们周围民族的社会生活之中,同时也希望保持我们前人的宗教信仰,然而我们却不被允许这样做。”^③

目前,国内现有研究侧重于美国犹太人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而忽视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对外政策的影响,特别是以色列在建国初期为了寻求美国援助并争取美国犹太人的支持而在“双重忠诚”、移民政策等方面妥协。^④国外相关研究虽然关注到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政府的内政外交决策影响,但是从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互动角度研究美国犹太人在美以特殊关系形成前期所发挥作用方面不多。^⑤与此同时,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档案记录也反映出其领导层内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以及给予以色列支持的限度方面有争论,涉及双方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共同立场,甚至引起了部分成员退出另立新的机构以示抗议。本文以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公开档案为主线,辅以以色列外交档案^⑥和美国解密档案,^⑦力图还原1948年至1950年期间该委员会与以色列政府围绕“双重忠诚”为核心的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关系定位的历史经纬,探究犹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在以色列建国初期,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美以两国政府间所起到的双向平衡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为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扫除了“双重忠诚”的障碍。

一、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及其对“双重忠诚”的预防和否定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的第181号决议规定:英国于1948年8月1日之前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并撤出其军队;两个月后,在总面积2.7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即阿拉伯国和犹太国。1948年5月14日,在以色列临时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

^①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年:一部历史》,杨波、宋立宏、徐娅囡译,徐新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

^②奥匈帝国犹太裔记者,1860年生于布达佩斯,后移居维也纳。1878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1884年获得律师资格并在政府机关担任律师一年后辞职。1885年受聘为维也纳《新自由日报》驻巴黎记者,后担任该报主编。1896年出版《犹太国》,提出现代政治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和纲领。1897至1902年先后参与组织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1904年因病去世后葬于维也纳。

^③西奥多·赫茨尔:《犹太国》,肖宪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1—23页。

^④薛永生、王耀明:《路易斯·布兰代斯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勃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邓蜀生:《美国犹太人同化进程初探》,《世界历史》1989年2期;杨阳:《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关系模式的转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9月第5期。

^⑤Horace M. Kallen, “Democracy Versus the Melting-Pot A Study of American Nationality”, *The Nation*, Feb. 18 and 25, 1915, pp.190—194, 217—220; Charles Liebman, “Diaspora Influence on Israel: The Ben-Gurion-Blaustein ‘Exchange’ and its Aftermath”, *Journal of Jewish Social Studies*, 1974. pp.271—280; Chronology of AJC activities concerning Palestine and Israel,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1918—1954), <http://ajcarchives.org/ajcarchive/BrowseResults.aspx?sess=62918&search=15ece21afdf564547ad51b9d3fa9b38ac>, 2022年6月8日;Ofer Shiff, Adi Sherzer, Talia Gorodess, “The Ben-Gurion - Blaustein Exchange: Ben-Gurion’s Perspective Between an Ideological Capitulation and A Strategic Alliance”, *Israel Studies*, Volume 25, Number 3, Fall 2020, pp.15—32; Ben Herzog, “Symbolism and Policy: Reading The Ben-Gurion - Blaustein “Exchange” in Relation to Citizenship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Studies*, Volume 25, Number 3, Fall 2020, pp.49—64.

^⑥以色列国家档案馆(ISRAEL STATE ARCHIVES)从1978年起陆续出版14卷本《以色列外交政策文件集》(“Documents 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Israel”, List of Companion Volumes in English, 1947—1960, <https://catalog.archives.gov.il/en/chapter/israel-diplomatic-relations-series-introduction/>),包括希伯来语正本和英语副本,2022年6月10日。

^⑦Gale “美国解密档案在线”数据库,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USDDO, <https://www.gale.com/cn/pre-view/c/us-declassified-documents-online>),2022年6月10日。

Gurion)宣布建国 17 分钟后,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在亲笔签署对以色列临时政府给予事实承认的新闻稿上,将“犹太国”字样划去,改为“以色列国”(The State of Israel)。而美国政府直到半年多后的 1949 年 1 月 31 日,才在以色列民选政府成立后对其进行法律承认。^① 对推动美国政府支持联合国大会通过巴以分治决议,并促成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以色列宣布建国后率先给予事实承认起了重要作用的机构,除了作为以色列准政府代表参加联合国相关会议的犹太代办处以外,还有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它一方面积极参与犹太代办处改组并增加其所代表的非锡安主义(Non-Zionist)美国犹太人的比例,另一方面则努力影响美国政府支持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关于两国分治方案的报告,并作为美国国务院和犹太代办处之间沟通协调立场的联系渠道。^② 对此,以色列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后兼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阿巴·埃班(Abba Eban)于 1950 年评价道:“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是确保美国政府财政和经济支持,以及美国犹太人社群财务援助的重要一环。”^③ 此外,《纽约时报》也认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是美国犹太组织的教长(the dean of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目标是成为维护全球犹太人和以色列利益的领导机构。^④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成立于 1906 年,其创建者大多是富裕的德国裔犹太人,他们积极参与犹太教改革运动。该组织利用其创始人的财富和社会影响力,主要在美国政府和国会高层幕后默默工作,目标是消除犹太移民全面融入美国社会生活的障碍,并尽可能确保生活在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享有平等地位。然而,“双重忠诚的幽灵自战前起就萦绕在美国犹太领袖的心头。……1898 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成立以后,美洲希伯来会众协进会(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 又译为“美国希伯来公会联盟”)向所有改革派人士保证:‘美国就是我们的锡安。’由显贵组成的美国犹太委员会也表达了类似意见。”^⑤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量欧洲犹太移民涌入美国,美国社会反犹主义抬头。面对锡安主义和美国主义(Americanism)对美国文化和价值观认同的可能对立,而再次引发“双重忠诚”的指责,影响美国犹太人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作为非锡安主义者(Non-Zionist)代表对此予以否定,并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支持专家对种族歧视原因和治理的社会科学研究,成立了科学研究委员会进行民意调查,提前做了预防措施。

二战爆发之初,孤立主义在美国民众中广泛流行。时任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的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于 1940 年访问美国后,认为美国“极端中立”。1941 年初事态有了转折,更多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不能无限期地中立下去。^⑥ 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美国正式参战以及纳粹屠犹的噩耗从欧洲传到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特别会议于 1942 年 5 月 6 日至 11 日在纽约比尔特莫饭店召开,时任犹太代办处主席本-古里安提出的八点纲领获得通过,又称“比尔特莫纲领”(Biltmore Program),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心从英国转向美国。^⑦ 纲领再次重申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无限制向巴勒斯坦移民和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共和国(Jewish Commonwealth)。这也是首次由非犹太复国主义者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共同公开声明支持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然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不愿签署该纲领,也不愿参加任何共同行动。^⑧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特立独行反映出其领导人对于战时可能受到“双重忠诚”指责的担忧。经过几个月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谈判,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批准了由该委员会主席莫里斯·沃特海姆(Maurice Wertheim)与本-古里安草拟的所谓“三角函数公式”(Cos Cob Formula)协议。该协议强调通过无限制移民和大规模殖民,犹太人可以在

^① U.S. Recognition of the State of Israel,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https://www.archives.gov/education/lessons/us-israel#background>, 2022 年 6 月 7 日。

^② Jacob Blaustein, *Detailing AJC efforts on behalf of Israel*, Speech delivered by Chairman of AJC executive committee at the AJC Annual Meeting, January 17, 1948, p.5, <http://ajcarchives.org/AJCArchive/BrowseResults.aspx?sess=71625&search=82e5fc0bde8e4aec8a4b719783fa5183>, 2022 年 6 月 10 日。

^③ Charles S. Liebman, “Diaspora Influence on Israel: The Ben-Gurion-Blaustein ‘Exchange’ and Its Aftermath”,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36, No. 3/4, July–October 1974, p.272.

^④ Who We Are | AJC, <https://www.ajc.org/whoweare>, 2022 年 6 月 8 日。

^⑤ 雅各·瑞德·马库斯:《美国犹太人,1585—1990 年:一部历史》,杨波、宋立宏、徐娅囡译,徐新校,第 206—207 页。

^{⑥⑧} 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徐方、阎瑞松译,三联书店,1992 年,第 668—669 页,第 671 页。

^⑦ 刘军:《美国犹太人:从边缘到主流的少数民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20 页。

巴勒斯坦成为大多数，并建立自治共和国。这个国家将给予所有居民平等权利，但是不会对其他国家的犹太公民地位产生任何影响。对于1942年6月达成的这个协议草案，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中的反锡安主义者(Anti-Zionist)、后来接任主席的约瑟夫·普洛斯考尔^①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沃特海姆为了避免该委员会的分裂，很快将其束之高阁。^②

根据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下属档案网站(AJC Archives)^③公开的历年会议记录和研究报告，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从1918年发表声明支持英国政府1917年发布的《贝尔福宣言》，到1938年发表声明反对英国皇家委员会关于分治巴勒斯坦的调查报告，再到1947年支持并积极推动联合国关于巴以分治的决议，最终在194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彻底转变了立场，加入了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美国犹太人大会(American Jewish Congress)和圣约之子会(B'nai B'rith)等其他美国亲以色列组织，大力支持以色列。可以看出，巴以分治是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对以色列态度和立场改变的分水岭，随之而来的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关系的定位问题反映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长久以来对“双重忠诚”指责的忧虑和恐惧，因而提前采取了应对措施，就1949年发生的本-古里安关于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相关言论的报道事件，积极与以色列政府高层交涉并施压，最终于1950年使其公开认可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主张和立场。

二、1948—1950年双方围绕“双重忠诚”的博弈

(一)1949年首次非公开会谈和双方立场调和

1948年1月18日，时任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普洛斯考尔在该委员会第41届年会发表致辞时指出，随着巴勒斯坦分治而产生一个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将给美国犹太人带来一个问题：“在我们作为美国人和犹太人的责任之间所谓的双重忠诚”。^④对此，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于1943年发布的声明已经明确不存在这个问题，并阐明了相关立场：“巴勒斯坦地区以外的犹太人不会对该地区建立的任何政府产生政治认同”。^⑤1948年10月16日，普洛斯考尔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以色列及其对美国的影响时指出“以色列国”应该取代拟议的“犹太国”称谓；官员宣誓就职应该是为了“以色列人民”的福祉而非“犹太民族”；还质疑以色列宪法条款草案规定只有犹太人可以担任以色列总统也是不明智的。^⑥然后，他当场宣读了以色列临时政府总理本-古里安发来的电报，表示希望加强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的联系，以增强全世界犹太人的尊严和福祉，并代表以色列政府邀请他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以色列。对此，他回复：“我们作为美国公民不能对以色列政治认同，但是作为你们的朋友，我们会在与作为美国人的责任一致的情况下尽力给予帮助。”^⑦1948年10月17日下午，执行委员会会议继续讨论以色列及其对美国的影响，并在会议结束前通过了两项决议：一是要求该机构官员提请以色列驻美国代表注意，为了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的最大利益，希望以色列国的政治结构和实践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宗旨相一致，并敦促该机构官员和行政委员会继续努力；二是要求该机

^①约瑟夫·普洛斯考尔(Joseph M. Proskauer)，德国和奥地利犹太移民后裔，1877年生于阿拉巴马州，1923至1930年担任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1943至1948年担任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1945年作为美国代表团顾问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确保人权保护条款写入宪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作证时提出的四点方案获得采纳。普洛斯考尔1949年后继续担任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荣誉主席直到1971年在纽约市去世。

^②Monty Noam Penkower, American Jewry and the Holocaust: From Biltmore to the American Jewish Conference,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47, No. 2 (Spring, 1985), pp.97—98.

^③2006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为庆祝成立一百周年，将其上百万份电子化文档，以及数百份音频和视频文件在其官方档案网站(AJC Archives, <http://ajcarchives.org/main.php>)免费公开并提供搜索下载服务，2022年6月10日。

^{④⑤⑦}Joseph M. Proskauer, *Our Duties as Americans – Our Responsibilities as Jews*, presidential address at AJC's 41st Annual Meeting, January 18, 1948, p.2. <http://ajcarchives.org/AJCArchive/BrowseResults.aspx?search=55c864c8cd814173b2c9fe927342d55e&from=26>, 2022年6月10日, p.3, p.11.

^⑥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Minute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s*, October 16–17, 1948, pp.10—11, <http://ajcarchives.org/AJCArchive/BrowseResults.aspx?sess=23151&search=74abed2e988540eb8a62e32113fceb32>, 2022年6月10日。

构官员继续提请以色列驻美国代表注意,避免引起干涉以色列国之外犹太人内部事务的嫌疑,即以色列政府将其作为全世界范围内犹太人或以色列国以外犹太社群的代言人。^①

1949年1月23日,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发布了修订后的“观点声明”,简单明了地指出:“美国公民是美国人,以色列公民是以色列人;正如我国政府仅代表我国公民,因此以色列也仅代表其公民。”^②与此同时,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召开的第42届年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原执行委员会主席雅各布·布劳斯坦(Jacob Blaustein)^③接替普洛斯考尔就任主席,普洛斯考尔作为荣誉主席继续参与该委员会工作。布劳斯坦在1950年1月21日召开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第43届年会发表就任主席后首次致辞时指出:1949年的“观点声明”一方面再次肯定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对以色列建国的支持,并认为这是当时解决欧洲犹太难民生存问题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重申了美以两国犹太人的差别,表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对以色列国未来的某些行为或声明可能给美国犹太人社群带来麻烦的忧虑,导致美国犹太人与其他美国人产生立场对立,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对可能发生的问题采取行动留下空间。^④1949年4月,布劳斯坦与新任执行委员会主席欧文·恩格尔(Irving M. Engel)、副主席约翰·斯劳森(John Slawson)应本-古里安私人邀请前往以色列访问。^⑤1949年5月7日,恩格尔在执行委员会议上报告了访问以色列的情况之后,布劳斯坦发言,特别说明通过此次访问得到以色列政府明确保证将避免代表除了其公民以外的其他犹太人。^⑥对此,布劳斯坦在第43届年会致辞中透露,在与本-古里安会谈时就以色列政府可能有意代表全世界犹太人的问题,他们得到了本-古里安与此相反的保证,他表示如果以色列被联合国接纳,他的答辞将明确:“以色列国不要求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对其效忠,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依赖于其公民的忠诚”。^⑦此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密切关注以色列和美国相关形势发展,不久以后本-古里安呼吁美国犹太人移民论引发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强烈反对。

1949年9月1日,美国犹太电报通讯社(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JTA)报道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于8月31日会见犹太总工会代表时,表示大部分犹太人还生活在以色列之外的国家,以色列需要来自美国的大规模犹太青年移民,并暗示如果他们的父母不鼓励他们移民的话,以色列将直接向犹太青年呼吁。9月11日,布劳斯坦在参加一次会议期间,向同为当天会议发言人的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埃班强调,以色列有责任不使其他国家的犹太社群尴尬或冒犯他们的敏感问题。^⑧9月19日,布劳斯坦致函本-古里安,对他此前的有关言论表示惊愕,并暗示如果其代表以色列的官方政策,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将重新考虑对以色列的立场。该信件副本也发给了以色列驻美大使埃利亚胡·伊拉斯(Eliahu Elath),并通过他转达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10月4日,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行政会议主要讨论了该问题,对布劳斯坦的应对措施表示认可,并敦促其继续努力直至获得满意的答复。^⑨10月16日,伊拉斯在与夏里特电话沟通

^①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Minute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s*, October 16–17, 1948, p.15.

^②The Statement of Views,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Vol. 51 (1950), p.562, http://ajcarchives.org/AJC_DA-TA/Files/1950_20_AnnualReports.pdf, 2022年6月11日。

^③立陶宛犹太人后裔,美国犹太人领袖、实业家、外交家,1892年出生于巴尔的摩,1910年与其父共同创立美国石油公司(American Oil Co.)。1945年,罗斯福总统委派他参与在洛杉矶举办的联合国筹备会议。1948年,作为美国犹太人领袖之一,布劳斯坦参与说服本-古里安接受联合国巴以分治决议。1949—1954年,布劳斯坦担任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卸任后作为荣誉主席直到1970年在马里兰州农场去世。

^④^⑦Jacob Blaustein, “The Mid-Century Challenge of American Jewish Life”, address by AJC President , Jan. 21, 1950, pp.4—5, pp.6—7. <http://ajcarchives.org/ajcarchive/BrowseResults.aspx?sess=a7fe49112df447d8b4d83583fc7ced07>, 2022年6月11日。

^⑤Chronology of AJC activities concerning Palestine and Israel,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1918–1954), p.11, <http://ajcarchives.org/ajcarchive/BrowseResults.aspx?search=40734e067a4a4e3fbabdd3a1d3d482c6&from=76>, 2022年6月11日。

^⑥AJC Minutes, Executive Committee, May 7–8, 1949, p.4, http://ajcarchives.org/AJCArchive/BrowseIssues.aspx?path=_G98_G982_G9825_G982510_, 2022年6月11日。

Jacob Blaustein, “The Mid-Century Challenge of American Jewish Life”

^⑧^⑨AJC Minutes, Executive Committee, October 22–23, 1949, p.3. http://ajcarchives.org/AJCArchive/BrowseIssues.aspx?path=_G98_G982_G9825_G982510_, 2022年6月11日。

后,向布劳斯坦保证本-古里安的言论在报道中的引用不正确,但是不准备发表直接否定的声明,而是按照他一贯做法通过肯定的声明来纠正错误的理解,并将在未来一两天与正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犹太联合呼吁组织(United Jewish Appeal, UJA)会面时发表。10月17日,布劳斯坦收到本-古里安秘书发来的电报,表示对布劳斯坦信件的详细回复很快就会抵达。10月19日,本-古里安给布劳斯坦的电报总结了他与美国犹太联合呼吁组织会谈纪要,并强调以色列经济建设需要美国技术支持,换句话说是鼓励有选择的从美国移民而不是大规模普遍移民。10月21日,伊拉斯致函布劳斯坦,表示本-古里安的最新电报肯定而清楚地表明此前言论被错误引用了,以色列政府无意干涉美国犹太人内部事务。对此,布劳斯坦认为整体效果是有益的,因为以色列官员再次确认了他们此前的保证,将美国犹太人的立场一直放在心中。他认为该事件再次表明与以色列官员建立密切和友好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在穷尽所有可能方式使其采取适当的方式主动修正相关问题之前,避免正面谴责本古里安的声明。^①在与会代表热烈讨论该事件后,普洛斯考尔作为荣誉主席总结发言,对布劳斯坦的应对措施表示认可,认为本-古里安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总理,个别代表希望他对被媒体报道引用的言论公开否认是不现实的。^②对于多个代表担心以后可能还会发生类似事件,普洛斯考尔认为有必要保持警惕,随后提出了会议决议草案供各位代表讨论。在最终通过的决议案中,除了重申相关立场以外,要求该机构官员保持警惕,避免未来发生此类有害事件或言论;在以色列派驻代表,向以色列民众广泛宣传其观点和主张,在以色列大力开展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已发起的教育项目,特别是在美国犹太人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方面加强宣传。^③

1949年12月15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以色列外交部长夏里特前往华盛顿,会见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三位犹太裔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④根据《以色列外交政策文集》第4卷所记录的当天会谈纪要,^⑤夏里特向弗兰克福特表达了几点想法,希望他能够通过合适的方式在适当的时候向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转达。夏里特指出,以色列在美国面临两大障碍,一是怀疑以色列有一天会加入共产主义阵营;二是美国犹太人的双重忠诚问题。这两个问题看似没有关联,但事实上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犹太人担心他们与以色列的关系会使美国政府质疑他们的忠诚,如同美国官员怀疑以色列可能转向东方集团。但是他们忽视或没有意识到以色列政府对加强与美国犹太人关系的重视。当美国政府意识到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之间更紧密的关系对其有利,并且这是防止以色列加入东方集团的最好保证时,这两个障碍才会被消除。虽然以色列无法给美国任何实体保证,如军事基地等,但是美国犹太人的存在提供了这样的保证,因为以色列无论如何也不会危及与五百万美国犹太人的联系。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及其对以投资并没有减少美国的财富,反而增强了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只有美国政府有能力消除对美国犹太人“双重忠诚”的质疑。夏里特建议,比如,艾奇逊可以发表公开声明表示美国政府支持美国犹太人在以色列投资,并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来自美国政府高层的这一纸声明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双重忠诚”问题。弗兰克福特对夏里特的想法表示支持,甚至补充提出杜鲁门总统应该是发表这个声明的人,因为比起艾奇逊,犹太人更加信任杜鲁门。他同意来处理此事,但是要求不要让其他人参与其中。由此可见,以色列政府在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调和关于“双重忠诚”问题的同时,也积极通过其在美国政府的渠道试图争取美国官方支持,进而达到增强美以关系的目的。

^{①②③}AJC Minutes, Executive Committee, October 22–23, 1949, p.4, p.6, p.10.

^④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于1882年11月15日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2岁时全家移民到美国,1902年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同年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1906年毕业后,弗兰克福特在纽约州担任律师助理,五年后进入塔夫脱总统的战争部担任法律官员。弗兰克福特活跃于美国锡安主义运动,曾作为美国锡安主义者代表团成员,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位大法官布兰代斯派往巴黎参加和平会议。1939年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前,弗兰克福特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任教,并在罗斯福担任纽约州州长期间和担任总统后为其提供法律咨询。1962年,辞去大法官职务后,弗兰克福特于1963年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1965年2月22日,弗兰克福特在华盛顿去世。

^⑤497. Meeting: M. Sharett-F.Frankfurter (Washington, 15 December 1949), Report: 130.02/2414/26, DOCUMENTS 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ISRAEL, VOLUME 4, May–December 1949, Edited by Yemima Rosenthal, COMPANION VOLUME, JERUSALEM 1986, Printed in Israel by the Government Printer, p.300.

(二)1950年公开会谈达成“交换意见”

1950年3月10日,布劳斯坦再次致函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全体会员,报告了上一年度执行委员会决议的后续执行情况。1949年10月会议结束后,布劳斯坦单独或与执行委员会主席恩格尔一起多次与以色列政府代表会谈,包括驻美大使伊拉斯、外交部长夏里特、常驻联合国代表埃班等。目的是表明虽然接受了本-古里安的解释,但不代表这一基本问题得到满意解决。布劳斯坦在与伊拉斯会谈时,表示对锡安主义者执行1897年巴塞尔纲领可能导致以色列干涉美国犹太人生活的担忧。伊拉斯回应称在以色列国内也认为该纲领在某些方面已经不符合现实情况,他和夏里特都保证以色列政府没有就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所反对的从美国向以色列移民做任何政策规划。布劳斯坦认为,通过与以色列官员的友好关系避免了他们发表有害言论,并会对其影响美国犹太人的政策保持密切关注,在必要时做出反应。1950年4月20日,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指导委员会上,布劳斯坦就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的关系问题发言时,表示他对以色列政府驻美国代表和美国锡安主义领导人的有关言论担忧与日俱增。布劳斯坦认为当前的情况有两条应对措施,一个是长期的,即持续加强正在开展的针对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关系的宣传教育活动;另一个是短期的,即对以色列政府官员和美国锡安主义领导人继续做工作,说服他们认识到其言论也伤害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对此,普洛斯考尔指出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所支持的巴以分治决议,是一个美国方案,而不是一个以色列方案,也不是一个锡安主义方案。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处理好与以色列官员和美国锡安主义领导人的关系,但要通过最高层面私人会谈方式,公开书面表达反对意见不会有任何好处。^①

1950年4月29日,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议就以色列对美国犹太人在美国生活的影响进行了讨论,主要与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问题相关。布劳斯坦报告了与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伊拉斯的后续会谈情况,他重申了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关系的立场,并向伊拉斯说明以色列政府任何试图在美国犹太人中煽动世界犹太民族主义的做法对以色列自身也是有害的。如果以色列政府的行为与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的期待相反,将有失去其支持的严重风险。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不认可任何有关美国犹太人“生活在流亡状态”(living in exile)及其未来前途在美国以外地区的观点,布劳斯坦认为这也是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所持有的观点。4月30日,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发布了包括布劳斯坦主旨演讲要点在内的执行委员会决议全文,特别指出两种极端的不同观点:一种是鼓吹在美国和以色列之外的其他国家不可能保持一个自由繁荣的犹太社群;另一种认为对以色列的同情与作为美国公民的责任不一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明确反对这两种观点,认为美国犹太人对他们的生活具有充分的信心,并说明将采用教育和沟通的方法来解决相关问题。^②

1950年8月,布劳斯坦应本-古里安邀请正式访问以色列,经过双方多次讨论,“本-古里安——布劳斯坦交换意见”(Ben Gurion-Blaustein Exchange of Views)^③于8月23日公开发表,以色列官方首次公开承认美国犹太人只对美国有政治认同,对以色列没有政治忠诚。对此,布劳斯坦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10月14日会议上做了详细报告,在1950年夏初,布劳斯坦预计以色列邀请他与本-古里安面对面会谈的时机基本成熟,在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指导委员会成员讨论了访问以色列的利弊之后,他决定在收到正式邀请时访问以色列。然而,当本-古里安发出的邀请函电报在7月28日抵达时,布劳斯坦没有马上回复接受。考虑到如果此访无法达成满意结果,将是非常尴尬的局面,布劳斯坦决定先征求行政委员会成员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考虑到以色列政府对布劳斯坦访以的主要目的充分了解,也明白访问失败带来的不良影响,因此布劳斯坦接受邀请访问以色列的风险是可控的。同时,布劳斯坦考虑到朝鲜战争爆发所造成的东西方阵营对抗影响扩散至全世界,他也征求了美国国务院的意见。负责近东、南亚和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基(George McGhee)不但敦促他前往以色列,还委托他就美国政府的相关观点与本-古里安进行沟通,布劳

^①Israel/American Jews & Israel File, Foreign Affairs Department Collection, FAD-1. Memoranda and committee minutes on relationship of American Jews to Israel, 1948-1950, <http://ajcarchives.org/AJCArchive/BrowseResults.aspx?search=7deab4361739432fac76a28865eb946f&from=26>, 2022年6月11日。

^②AJC Minutes, Executive Committee, April 29-30, 1950, pp.3—8, http://ajcarchives.org/AJCArchive/BrowseIssues.aspx?path=_G98_G982_G9826_G98261_, 2022年6月12日。

^③“An Exchange of Views: American Jews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53 (1952), pp.564—568.

斯坦决定接受访问以色列的邀请。抵达以色列后,布劳斯坦与本-古里安,外交部长、财政部长等政府部门领导,以及美国政府驻以色列代表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会谈。讨论的议题也涵盖多个方面,包括以色列移民政策等,但是集中讨论的主题还是以色列与世界其他地区犹太人社群的关系。本-古里安认可在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犹太人已经成为所在国家的一部分,并认可其为自己的祖国。因此,以色列将世界范围内的犹太人分为三类:第一类生活在以色列;第二类生活在受到压迫和处境危险的国家;第三类生活在民主国家。以色列认为只有第二类犹太人生活在流亡状态。在基本达成一致之后,布劳斯坦希望本-古里安考虑发表一个体现以色列政府官方认可的声明。本-古里安表示虽然这一声明可能带来麻烦,他还是同意安排专人起草文本。此后,双方就文本内容又进行了多次讨论,最终在8月23日为布劳斯坦安排的官方午餐会期间通过双方交换意见的方式发表。^①

(三)“交换意见”的后续影响

困扰美国犹太人多年的“双重忠诚”问题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持续不断的努力之下,通过与以色列政府总理本-古里安共同发表公开声明的方式解决了,这似乎可以就此划上一个句号。布劳斯坦也在1951年1月27日召开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第44届年会发表致辞^②时,将“双重忠诚”列为完成的事项,虽然有所保留地加上“当然无法保证”一词。然而三年后,布劳斯坦在1954年1月30日召开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第47届年会发表离任演说^③时,明确将“以色列与其他地区犹太人关系”列为未解决的问题,谈到他与本-古里安在1950年发表的“交换意见”时,自豪地将其作为自己担任主席期间的重要成就之一。虽然持有极端观点的犹太民族主义者或“双重忠诚”质疑者认为本-古里安的声明只是“战术机动”(tactical maneuver),并批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过于幼稚而轻信了一纸声明,布劳斯坦认为“交换意见”确实澄清了“双重忠诚”问题,也使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打交道时比之前更加务实。此后美以关系发展的历史也证明,美国犹太人“双重忠诚”问题在“交换意见”公开发表后的一段时间内,确实没有干扰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但是这颗不定时炸弹在三十年后的1984年引爆,由于曾供职于美国情报分析机构的犹太人乔纳森·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因涉嫌向以色列透露美国机密情报被捕受审,而再次引发美国社会对犹太人“双重忠诚”问题的关注,也为美以特殊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与此同时,“本-古里安——布劳斯坦交换意见”的发表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以色列执政的工党(Mapai)领导层内部发生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在本-古里安于1953至1954年辞职休养期间发生的“拉冯事件”(Lavon Affair)^④助推之下,延续到1960年因“拉冯事件”再次调查问题导致工党高层对本-古里安领导力的质疑,最终在1963年迫使本-古里安正式辞职。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1961年2月8日提供给肯尼迪总统军事助理的一份关于《以色列政府危机、本-古里安的立场和“拉冯事件”》的内部备忘录^⑤所述,本-古里安的辞职是执政的工党内部长期存在的个人权力和意识形态争议所导致的,在1960年12月和1961年1

^① AJC Minutes, Executive Committee, Oct. 14–15, 1950, pp.2—3, http://ajcarchives.org/AJCArchive/BrowseIssues.aspx?path=_G98_G982_G9826_G98261_, 2022年6月12日。

^② Jacob Blaustein, “The Crisis We Face”, address by AJC President at the 44th annual meeting, Jan. 27, 1951, <http://ajcarchives.org/AJCArchive/BrowseResults.aspx?sess=69708&search=9e5e42274c094d7b91abdf46d81ba5f0>, 2022年6月12日。

^③ Jacob Blaustein, “The Fight for Freedom—Problems and Prospects”, address by AJC President at the forty-seventh annual meeting, Jan. 30, 1954, <http://ajcarchives.org/AJCArchive/BrowseResults.aspx?sess=72902&search=bb1e0cf9bd4a4ee8a914ccf2d092124c>, 2022年6月12日。

^④ 平哈斯·拉冯(Pinhas Lavon)是当时以色列公认的在本-古里安之后最有实力和经验的领导人,1954年曾担任以色列国防部长,被迫辞职后担任以色列最大的工会组织——犹太总工会(Histadrut)秘书长,一度被认为是本-古里安卸任后总理职务继任者。1953年末至1954年,本-古里安辞职休养期间,拉冯作为鸽派的夏里特总理内阁国防部长,支持其与埃及秘密和谈。但是以色列军方鹰派的军事情报处私下实施“苏珊娜行动”(Operation Susana)训练犹太特工前往埃及对开罗和亚历山大的美国新闻署(USIS)图书馆实施爆炸,意图离间美国与埃及的关系。埃及安全部门发现后抓捕了13名犹太特工,并进行公开审判。夏里特总理对此毫不知情,内部调查后发现,军事情报处负责人指责拉冯授权执行,导致其被迫辞职,史称“拉冯事件”。

^⑤ Memorandum for: Brig. Gen. Chester V. Clifton, Military Aide to the President, February 8, 1961, Office of the Director,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SECRET. SANITIZED copy. Released Mar. 27, 1979.

月期间达到高峰。“拉冯事件”引发了紧张状态，导致本-古里安通过再次批评流散犹太人不愿意移民到以色列，转移国内外注意力。然而，真正的问题核心在于以色列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以色列未来领导权在时年74岁的本-古里安去世或辞职后的继承人选，以及以色列国内复杂的意识形态争议。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犹太人因其对以色列的巨额捐款，并游说美国政府对以色列赠款和贷款，而对以色列政府领导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为了把慈善捐款转变为实在的投资，本-古里安和工党的许多领导人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犹太人做出了与其原有锡安主义理想不一致的妥协和让步。通过营造一个更加令美国犹太人认可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以色列希望美国犹太人能够被吸引而选择移民以色列，这是锡安主义的主要目标，也对以色列的安全至关重要。这些改变导致了锡安主义教条者的警惕，特别是拉冯谴责以色列人开拓热情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堕落。本-古里安虽然也致力于以色列安全和锡安主义运动，但他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相信只有不断增加的犹太移民才能重建锡安并保障以色列的安全。然而，每个犹太移民都需要在以色列找到与国家发展所需的工作。因此，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充分利用犹太人的智慧，以弥补自然资源不足的缺陷。考虑到以色列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有足够的人口保证国土安全，本-古里安在其内阁大多数成员不知情的情况下，于1956年下令建造第二个可以制造钚元素的核反应堆，以备在需要时可以生产原子弹。一直到1960年，英国和美国媒体才发现并报道以色列的核试验，导致美国肯尼迪政府对此强烈反应。为了转移国际压力，本-古里安在1960年12月出席在耶路撒冷举办的世界锡安主义大会第25届年会致辞时，对流散犹太人不移民以色列进行批评。他引用圣经关于在以色列以外生活、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被认为没有上帝，引发美国犹太人的广泛抗议，也动摇了美国锡安主义组织的根基。根据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下属的“人类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于1964年发表的一份关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关系的报告，^①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荣誉主席的布劳斯坦于1961年初再次与本-古里安交涉，4月23日在耶路撒冷与本-古里安发表共同声明对1950年“交换意见”双方所持立场再次肯定，并得到本-古里安的保证“将尽其所能在未来保证执行所达成共识的精神和文字内容”。在返回美国之前，布劳斯坦与以色列内阁成员再次回顾了与本-古里安共识的内容并得到认可。1963年，本-古里安辞职，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继任以色列总理，布劳斯坦分别致函本-古里安和艾希科尔，得到他们对此前双方共识的确认并承诺继续执行。1963年11月，布劳斯坦应艾希科尔邀请访问以色列，对双方共识又一次当面重申过去双方已形成的共识。此后，关于“双重忠诚”的“交换意见”与双方共识再也没有出现被违反的重大情况，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认为其成为以色列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犹太人发展关系的重要原则。

余 论

在世界各多民族国家中，基于特殊的族裔与宗教文化认同而对其他国家或民族抱有一种复杂情感的情况并不鲜见。200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在当今多样世界中的文化自由》，^②将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的兼容性问题列为当代世界政治的一个核心要素。在两者关系研究方面，当前国内学界大致形成了冲突论与共生论两种对立的观点，^③而且冲突论远超共生论，但是国外学者研究从多角度为共生论提供了支持。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关系定位的历史经纬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相兼容的共生论。而在族群认同方面，存在着原生论和工具论两种相对立的理论。^④原生论相对稳定、依靠传承而延

(下转第152页)

^①In Vigilant Brotherhood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s Relationship to Israel and Palestine, published by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1964), <https://ajcarchives.org/ajcarchive/BrowseResults.aspx?sess=50273&search=e03fd933beb543a9afad99d0a8c1b8e3>, 2022年11月27日。

^②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4.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4: Cultural Liberty in Today's Diverse World*. New York. <https://hdr.undp.org/system/files/documents//human-development-report-2004-english.human-development-report-2004-english>, 2022年8月13日。

^③郝亚明：《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共生：理论评述与探讨》，《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第25—38页。

^④袁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第91—103页。

本原理又要能适应不同学生的要求,以便通过强化练习纠正原有的错误理解或片面认识,最终达到符合要求的意义建构。”^①因此,这个环节的设置不能简单等同于以前的课堂训练,题目设计要围绕学科核心素养,针对性强,检测目标明确且层次分明,示例如下:

1886—1889年伦敦茶叶进口来源统计表(单位:磅)

项目年份	1886年	1887年	1888年	1889年
福建功夫茶	98116414	79273588	75632033	58161531
印度红茶	54666864	67704236	71584113	80509995
锡兰红茶	5207209	8409700	15454946	26099840

造成表中数据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A. 英国民众饮食结构发生变化
- B. 世界各地茶市无序竞争
- C. 福建红茶传统制作工艺没落
- D. 西方资本操纵国际市场

上述示例通过对英国进口茶叶来源统计数据的分析,考查学生对世界市场形成与发展及其对商业贸易的影响,完成单元教学目标第一层次的检测。学生在解题过程中,考查学生通过史料和选项的阅读和分析,准确解读信息得出结论,考查学生的史料实证、唯物史观、时空观念与历史解释等素养,完成单元教学目标第二层次的检测。这样的示例设计,不在多而在典型,试题的检测指向精准,以求达到事半功倍之成效。如此综合评价设计,既可检测学生知识与能力的达成度,又可检测学生学科素养的达成度,既评价了“教师的教”,又评价了“学生的学”,体现了“第三代教学设计”“教—学—评”一体化的理念。

概言之,基于“第三代教学设计”的单元教学,可以在多方面优化教学实践,尤其是在构建单元整体教学中能突出学科知识、概念和逻辑,使历史教学更有历史味;在引导学生深度学习时便于情境化任务型问题设计,使学生学习直接触及历史学科本质;在教学评价上便于多维度综合评价路径的创设,使“教学评”互动相融。

(责任编辑:李月琴)

^①何克抗:《教学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评论(中)》,《电化教育研究》1998年第2期。

(上接第110页)

续并维持的认同,不会随着社会境遇的变化而变化。工具论强调认同的场景性、不稳定性和成员的理性选择,利益是个人和群体选择认同的核心考量。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领导层在应对“双重忠诚”的潜在威胁方面,既有原生论关于犹太身份认同的历史传承,也有工具论基于利益的理性选择。犹太人因其近两千年的流散历史,在反犹主义,特别是“双重忠诚”的压迫之下,在居住国普遍有一种不安的情绪和紧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屠犹发生以后,美国犹太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犹太社群,已经在美生活多年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犹太精英们,以维护犹太人的安全和融入美国社会为己任,为避免反犹主义在美国再起,在身份认同方面始终以美国主义为旗帜,对世界犹太民族主义高度警惕。然而,“双重忠诚”背后的身分认同危机并未就此解决,“拉冯事件”及其背后的锡安主义意识形态争议,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巨大胜利,美国与以色列特殊关系的建立,苏联解体后上百万犹太移民以色列,世界范围内犹太人口的分布发生新的变化等一系列因素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责任编辑:林广)

The Governance of Urban Sanitation in Early Modern France (LIANG Guirong, XIONG Fangfang)

In early modern France, the urban environment and sanitation were gradually incorporated into municipal governance. From the 16th to the 18th century, the monarchy and city authorities had issued a series of sanitary acts and decrees,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spread of plagues and diseases, improve the urban environment, and maintain the health of city dwellers. These decrees not only encouraged the participation of various social groups in the disposal of waste, pooled the funds needed for urban sanitation, but also set up the governing body with specialized officials. In the process of law enforcement, the Chambre de police could punish all kinds of behaviors violating decrees and regulations. In particular, th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relocation of abattoir had been one of litmus tests of city governance capacity. Through legislative and administrative practices, the royal court and city authorities aimed at regulating the behavior of city residents, and were committed to improving urban sanitations, which has ever since institutionalized urban governance in France.

Measures and Reflections on San Francisco's Response to the Plague in 1907 (WANG Zhiyong)

In May 1907, the plague broke out suddenly in San Francisco, which brought great harm to the city life. The San Francisco government carried out an unprecedented large-scale mobilization, not only encouraged the public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rodent control, but also started urban renovation and urban sanitation actions. In the end, the plague was quickly controlled, which protected the lives and health of the people, and at the same time brought a new look to the city. San Francisco's experience in dealing with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by actively establishing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improving urban sanitary environment, and actively carrying out modern urban transformation was worthy of reference.

“Dual Loyalty”: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nd the Israeli Government and Its Aftermath (1948-1950) (WANG Jian, LÜ You)

The accusation on “Dual Loyalty” against Jews spread to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with the Jewish Diaspora since the first century, and it has become a typical term of antisemitism in modern times. When the State of Israel established in 1948,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 major non-Zionist Jewish organization in the U.S., kept negotiating with the Israeli government on the “Dual Loyalty” issue which was at the core of American Jews’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Such negotiation did not end until the two sides met in 1950 and publicly stated the “exchange of views”. However, the identity crisis behind the “Dual Loyalty” was not truly solved, and it had a lasting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between both parties.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s Military Assistance Policy toward Burma (1953-1960) (LI Conghui)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s military assistance policy toward Burma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from “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 to “separate treatment” to “enhanced penetration”. In 1953, the U.S. government insisted on handling military aid to Burma in the framework of 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 but it did not gain Burma’s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With the end of the Anglo-Burmese Defense Agreement in 1954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Burmese border conflict the following year, the U.S. began to deal with military aid to Burma separately, gradually establishing the policy of maintaining Burma’s political stability through police aid and enhancing the military strength of the Burmese army through military aid. In 1958, the U.S. used the aid to strengthen its military infiltration in order to win Burma’s trust and support in the East-West confrontation. In general, the adjustments of U.S. military